

论北宋悯农诗

高峰

〔摘要〕 北宋悯农诗歌远承《诗经》、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近师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通过多重对比手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北宋土地、赋税、劳役等制度重压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极度悬殊、阶级尖锐矛盾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的悲悯、痛恨、愧疚等等复杂感情。尤其在新旧党争中，更加体现出有识之士关心民瘼、改革弊政的胆识和勇气。受到宋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北宋悯农诗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彰显了宋诗特有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 北宋；悯农诗；新旧党争；议论化；散文化

一、时代背景

宋朝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无奈的文明时代”。称其为文明时代，因为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科技等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但是这个所谓的文明时代，又是一个政治腐败低效、财政入不敷出、军事软弱无能的积贫、积弱的时代，深陷在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怪圈中难以自拔。早在《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中，即已指出：“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②《宋史·王禹偁传》也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③宋朝统治者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对士大夫文人给予优渥的待遇，致使“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④，又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宋朝土地制度的特点是“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即承认土地私有，政府负责征税，只关心土地的占有状况，而对其买卖并不禁止，这就使得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手里。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大地主占有的土地竟达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0%。土地的高度集中，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高峰，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7）。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第245页。

②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126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57页。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86页。

他们辛勤劳作却所得无几,经常处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①的窘境,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遇灾荒,更加民不聊生,“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②。对此,刘克庄《备对札子》慨叹道:“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③

长期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大积弊,以及向辽、西夏年年交纳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使得宋代士大夫忧心忡忡。与南宋围绕宋金关系而展开的和战之争相比,北宋的文人党争更多集中在围绕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士大夫文人更多关注广大农民的疾苦,写作了数量众多、思想深刻的悯农诗,既展现出广大乡村的凋敝、农民的悲惨,也鞭笞了统治者盘剥人民的罪恶,还表露出身为封建官僚无策济民的道德自责。

二、农人苦楚

北宋悯农诗是一个题材丰富的创作空间,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柳永、文同、王安石、郑獬、吕南公、张舜民、苏轼、苏辙、陈师道、张耒等诗人不仅描摹农人劳作的艰辛、遭受天灾的无助,更倾吐他们被虐政人祸逼迫的悲愤、流离逃亡的绝望,同时也从侧面揭示了新旧党争当中针对民生问题的尖锐矛盾,可以说是对北宋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形象展现和深刻反思。

(一) 劳作艰辛

柳永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曾经担任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官,创作了《鬻海歌》,对盐民劳作的艰辛表示深切的同情。此诗题下小注曰:“悯亭户也。”诗人运用他擅长铺叙的手法,形象展现盐民晒盐、熬盐的艰辛劳动过程:“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溜成卤。”他们把含盐的泥块“铺于席上,四围隆起作一堤垆形,中以海水灌淋,渗入浅坑中”^④,成为盐卤。然后不避虎豹,上山砍柴,用来熬卤成盐。盐民长年忍受着“巨灶炎炎热”的炙烤,才换得“波涛变为雪”的白花花的劳动果实。清代《如皋县志》曾经这样记载盐民之苦:“晓露未晞,忍饥登场,刮泥汲海,伛偻如猪,此淋卤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如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此煎办之苦也。”这正是柳永此段诗意的绝好注解。诗人由此为盐民请命,祈求朝廷施行仁政,“君有馀财罢盐铁”,体现出讽谏之意,对于元人王冕《伤亭户》、清人吴嘉纪《风潮行》等悲悯盐民之作起到了先驱作用。

张舜民的《打麦》诗运用快速流转的镜头描绘农民抢收打麦的劳动场景。首先,“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山北”,通过急速的声音渲染,展现出一派紧张劳作的乡村景象。接着描摹农家刈麦的麻利动作:“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由此突显出劳动节奏的紧凑、农人神情的专注。“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则将他们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田家生活艰辛,但是年成尚好,他们努力劳作,毕竟可以免于饿死道旁。所以诗人最后感叹道:“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展现了广大农民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劳作无歇的苦辛。李觏的《获稻》也通过细节刻画,表现农妇劳作的艰辛:“朝阳过山来,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青黄先后收,断折佝偻拾。”农妇大清早就赶到田里割稻。农忙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91页。

②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517页。

③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五一,第6册,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41页。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33页。

之余还要赶回家去照管孩子,一路上都不敢跟人搭话。她收割了稻子后还弯下腰去,在田里拾取断折刺落的稻谷。这样的画面非常类似于法国画家米勒所绘的《拾穗者》,形象展现出农妇的悲惨生活。此外,苏辙描写忠州“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的《竹枝歌九首》中,“双鬓垂顶发已白,负水采薪长苦艰”、“天寒斫木手如龟,水重还家脚无力”、“山深瘴暖霜露干,夜长无衣犹苦寒”,尽显边远地区妇女承担繁重劳动却又饥寒交迫的悲惨遭遇,表达了诗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

吕南公的《老樵》则将老年樵夫的悲惨景况刻画得相当细致感人:“何山老翁鬓垂雪?担负樵苏清晓发。城门在望来路长,樵重身羸如疲鳖。皮枯亦复汗淋漓,步强遥闻气呜咽。同行壮俊常后追,体倦心烦未容歇。街东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厉声唤。低眉索价退听言,移刻才蒙酬与半。纳樵收值不敢缓,病妇倚门待朝爨。”诗歌描写一位两鬓如雪、皮枯骨瘦的年老樵夫,大汗淋漓、气喘呜咽地跋涉在担柴道路上,身后的壮俊樵夫纷纷追赶上他。他虽然身心憔悴,仍然不敢稍作歇息,步履蹒跚地向前赶路。好不容易到了城里,还得低眉俯首、委曲求全地听任少年买主的呵斥,讨价还价半天,才得到微薄的薪酬。樵夫卖完柴后不敢停留片刻,因为家中的病妇还在倚门而望,等着买米下锅,勉强糊口。这首诗与白居易《卖炭翁》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对其担柴形象的刻画、病妇倚门盼望的设想,更加悲楚感人。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①北宋悯农诗人同样深怀民胞物与之心,设身处地感受农民劳动的艰辛,方能“代匹夫匹妇语”,真切、形象地展现出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体现了格外深刻的思想内涵。

(二) 天灾凶荒

封建时代农民丰岁仅得勉强度日,遇到旱、涝、蝗灾则难免家破人亡的悲剧。郑獬《滞客》通过旅中滞客的视角,流露出对农家遭遇旱灾的同情。农村已经连续两个月滴雨未下,旱情非常严重。接下来突起波澜,“忽惊黑云涌西北,风号万窍秋涛奔”,眼看着乌云密布,八面来风,甘霖将至,农民心里充满着欢欣的期待;然而“截断雨脚不到地,半夜霹雳空杀人!须臾云破见星斗”,光打雷不下雨,老农“叹息如衔冤”,充斥着绝望的悲痛。由于久旱不雨,农田里的庄稼已经枯槁绝收,面对如此惨象,诗人满怀同情和悲悯。

正所谓“旱极而蝗”,与严重旱灾相伴而生的就是蝗灾。大量的蝗虫遮天蔽日,席卷而来,吞食禾田,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由此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苏轼《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行》“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即描绘出北方农民遭受蝗旱之灾的痛苦。唐人白居易在《捕蝗》诗中描述了蝗虫袭来“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的惨状。作者的主旨则是强调“善政驱蝗”,所以诗题小注为:“刺长吏也。”受此影响,宋人王令运用浪漫的想象创作了姐妹篇《原蝗》《梦蝗》。在《原蝗》中,诗人为蝗灾泛滥寻找原因,终于得出答案:“始知在人不在天。”正是统治者政治腐败、无所作为,才会使得蝗灾如此肆虐。在《梦蝗》中,首先描摹蝗灾造成的巨大破坏惨象:“朝飞蔽天不见日,若以万布筛尘灰。暮行啮地赤千顷,积叠数尺交相埋。”诗人采取寓言体的形式,在梦中对蝗虫展开义正辞严的斥责,坚定地表明自己为民除害的决心。然而蝗虫的辩解则深刻地揭露出人间豪门权贵对广大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比起蝗害更加酷烈:“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筌笙,别屋闲嫖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统治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盘剥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诗歌对封建社会黑暗本质的鞭挞是相当激烈和大胆的。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指出:“大地生物,无理取闹者至夥。吾欲仿屈原《天问》,作《地问》

^①刘熙载:《艺概笺注》,王气中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一篇，逢原有此才，恨不起九原，使操笔赋之。”^①

梅尧臣的《小村》创作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通过对淮河沙洲上一个小村景象的描写，揭示了农民惨遭水灾之后的痛苦：“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漫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梅尧臣的诗歌注重炼字炼意，首联即通过炼字展现出诗人复杂的心绪。“忽”字描写茫茫泽国当中忽然见到一个小村，似乎带有劫后余生的喜悦；然而后面的景物描写则展现出村庄景象的萧条。颔联描写村中寒鸡呼伴、老汉抱孙的场景，带有一丝人情暖意，但是“寒”、“无衣”又渲染了瑟缩可怜、催人泪下的氛围。颈联转而描写衰飒的自然景象：野艇之上阒然无人，唯余断缆；枯桑被水啮走，只剩下残留的树根。如此惨状越发衬托出荒村的颓败凄凉。这里的人民无以为生，家家户户只得在饥寒交迫中忍受煎熬和痛苦。然而更让诗人悲愤的是，灾民们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抚恤，还被谬误地编入交租的户籍，如此痛苦的日子何时才能到头！故而陈衍评析此诗道：“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风。”^②刘敞的《城南行》同样描写八月涨潮后“大堤夜坼声嘈嘈”，江堤决口，众多村民不幸遇难。诗歌最后写道：“城南百姓多为鱼，买鱼欲烹辄凄恻。”受难村民的厄运刺激着他的良心，使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此外，司马光《又是和夜雨宿村舍》“今兹昏垫灾，大野成洪流。直疑沧海溢，蚕粟浮陵丘。昔时百丈原，泛泛皆拏舟”、苏轼《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饱不及黎元”等诗句，也都表达出对遭受洪涝灾害的农民的深切同情。梅尧臣的《田家语》“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则交代了农民接二连三地遭受水灾和蝗灾的侵害，展现出田家无以聊生的悲惨处境。

(三) 人祸酷烈

相较于天灾的侵袭，封建时代无孔不入的租税、徭役、兵役、羡馀等等盘剥，则给广大农民套上了更加沉重的枷锁。

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赋税和力役两部分。其中赋税承唐制，主要采取两税法，即按纳税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等；秋税收稻、粟、豆类、草等。两税正额之外还有加耗，宋朝规定广南地区正税一石另交二升为鼠雀耗。各路转运使有“抛桩明耗”，州县则有“暗桩暗耗”。加耗名目繁多，弹性很大，往往使税户负担成倍增加。宋朝国库的充实，主要依靠对于农民不断加重的赋税。正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所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1021)，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祐(1056—1063)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1068—1085)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③在这些不断翻番增长的国库财富背后，却是无数百姓痛苦不堪的生活。

梅尧臣《田家语》开头四句写道：“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接连遭受天灾的农户还要成天被地保、里长催逼着交税，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曾巩的《追租》诗也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描写农民的悲惨遭遇。面对着“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的严重灾情，饥民嗷嗷待哺。统治者却罔顾人民的死活，凶狠地逼租，致使百姓“愁呼遍郊野”、“斯须死笞缚”。诗人不禁激愤地责问官府：“公卿饱天禄，耳目知民瘼。忍令疮痍内，每肆诛求虐！”从而发出了“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强烈呼声。其《胡使》“还来里间索穷下，斗食尺衣皆北输”，更加一针见血地针砭了宋廷屈

^①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16页。

^②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第116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9页。

己事敌、将国财民膏拱手送敌的罪恶。司马光的《道旁田家》描写家境贫寒、又无子息的老农夫妇到薄田收割庄稼,深夜避着债主偷偷舂米;然而到了黎明时分,盈门债主已经无法应付,更不用说县官的催逼租税了:“精疲力蔽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满纸辛酸,不忍卒读。苏轼在黄州所写的《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其二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寥寥数笔,展示了一幅县吏深夜催租图,控诉了租赋的苛重扰民。他的《渔蛮子》则描写一家渔民为了逃避租税剥削,长年漂泊水上,双足不践寸土,生活十分艰难:“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对封建社会无孔不入的租税剥削给予了无情的谴责。欧阳修的《边户》则结合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的实际情况,反映宋廷虽然采取妥协屈服的策略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是边境地区的农民却不得不忍受来自宋、辽双方的赋税盘剥:“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宋朝军队生怕“生事”,于是对本国边民多加约束:“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连农民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真是对“庙堂为远图”的莫大讽刺!

宋朝除了实施严苛的赋税制度,还采取繁杂的徭役制度,每年都要征发农夫疏浚河道、修筑堤防、营建宫殿,战争时还要运送大批物资,不仅耽误了农时,而且封建官府的催逼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惨状。梅尧臣《田家语》诗前小序写道:“庚辰(康定元年)诏书,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郡吏畏,不敢辩,遂以属县令。互搜民口,遂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岂助圣上抚育之意耶?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仁宗康定元年(1040)夏,西夏攻打大宋,宋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三丁抽一壮丁,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各级官府层层施压,官吏变本加厉地搜捕抽丁,就连老人和儿童都难以幸免于难。诗歌写道:“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鞬。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如此急如星火的情势,非常类似于杜甫“三吏”、“三别”所写安史之乱当中人民遭受劳役之苦的惨状。他的《汝坟贫女》则通过汝河边上的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进一步交代了朝廷横征丁壮,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诗前小序云:“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诗中的贫家女与老父相依为命,由于朝廷征集弓手,强迫老父应征。老父“龙钟去携杖”,如此老迈之人还得拄着拐杖应役,其悲惨结局可想而知。贫女“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恳请同行的乡邻,千万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其结果不出所料,“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面对如此人间惨剧,贫女只得“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正是封建朝廷、腐朽官僚的兵役制度,把人民逼上了生不如死的绝路。因此,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指出:“观此二诗,与《石壕吏》等篇何以异?当是时,乃太平极盛之时,而一有籍民为兵之令,便觉气象与天宝相似。”^①陈师道的《田家》诗则反映了农民深受徭役之苦:“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秋来公事急,出处不待时。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这位农民早出晚归,每天都在忙于为公家服徭役。如今本是秋收农忙的季节,但是官府征役“无间四时”,根本不顾农户庄稼的情况,从而使“耕耘收获稼穡之业几尽废也”^②。后面四句描写在绵绵不断的秋雨中,农户家里积水三尺,屋漏墙敝,已有多日炊火不举。一家老小将如何生存?服役农民家庭的痛苦可想而知,在其慨叹的背后,自然饱含着诗人对于官府的无限愤激之情、对于农民的深切悲悯之意。

唐朝以来,封建官员为了邀功请赏,经常以赋税盈馀的名义向朝廷进贡财物。《新唐书·食货志二》记载:淮南节度使杜亚等“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羨馀’。”^③白居易《重赋》咏道:“缢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羨馀物,随月献至尊。”《宋史·食货志下》亦载:“时又有元丰库,则杂

①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275—5276页。

②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93页。

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92页。

储诸司羨馀钱。”^①众多官员欺上瞒下,纷纷进献各地珍贵名产,无疑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苏轼贬放岭南期间,所作《荔支叹》即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诗歌开头八句首先追叙汉和帝时进贡交州荔枝、唐玄宗时进贡涪州荔枝,给人民带来了“颠坑仆谷相枕藉”、“惊尘溅血流千载”的惨痛悲剧。诗人由此对统治者提出规劝:“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接着,他揭露当朝官吏献贡邀赏的行径:“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福建武夷山盛产名茶,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宋仁宗时的学士蔡襄先后献贡此茶,以邀宠赏。诗人不禁责问圣上:“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实则规劝君王不要贪享口腹之欲,而应以治国安民为重。诗作最后又起波澜:“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以西京留守钱惟演献贡洛阳名贵的姚黄牡丹,进一步对官吏不忠不孝的行径给予嘲讽和谴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六评析道:“诗本为荔枝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之文也。”此诗饶富“史诗”特性,纪昀评之曰:“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是杜法。”^②

(四) 党争歧见

北宋时期,围绕着富国、强兵的建设目标,出现了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新旧党争。王安石早年立志匡时济世,“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自期颇为高远。庆历七年(1047),调充鄞县(今属浙江)知县,关心民生疾苦,初步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记载,王安石在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③。在此期间,他写作了《秃山》《收盐》等诗作,对封建弊政丛脞、官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中,《秃山》的构思受到柳宗元《憎王孙文》影响,采取寓言体的形式,讽谕当时的大小官吏像猴子一样不事生产、各谋私利、巧取豪夺,最终坐吃山空,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座“秃山”,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于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收盐》则反映宋朝盐茶专卖制弊端甚多,逼得海边居民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诗人由此发出呼吁:“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充分体现了王安石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也激发起抨击时弊、锐意改革的精神动力。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被改派为舒州通判。在此期间,他写作了《兼并》《感事》《发廩》等诗作,揭露了土地兼并、豪强官吏盘剥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兼并》首先感怀夏、商、周三代君王爱民如子、公私合一,坚决杜绝各种奸邪的念头。后世统治者为了追求利益,却鼓励民间各种奸邪行为,遂使“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俗吏、俗儒助纣为虐,造成了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社会动荡日趋危殆的局面:“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诗歌最后,通过与开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材”的对照和呼应,表达了对于当今官府与民争利的强烈谴责:“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诗人正是从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提出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改革主张。《感事》诗则以质朴无华的陈述,真切展示了在严酷的盘剥压榨下广大农民走投无路的悲惨景象:“间关幸见省,鞭笞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正是有感于广大民众的苦难遭遇,促使王安石对于改革弊政进行了全面思考、通盘设计。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诏回京,次年出任参知政事,后又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支持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932页。

^②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26页。

^③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第1769页。

下大力推行新法改革。新法主要针对宋代开国百年以来所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在理财、整军、调整官僚机构、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了均输、青苗、募役、保甲等新法,收到了一定实效。他的《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歌元丰五首》等诗描绘元丰年间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以此来彰显新法推行的成效。然而,新法的推行对富商大贾和兼并势力有所抑制,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而且在新法推行过程中,由于方法失当、所用非人等因素,也产生了种种流弊,造成新法扰民的后果。这就给反对派造成口实,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李觏等人也从悯农的立场出发,对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弊政口诛笔伐。苏辙自元丰年间以来经历了一系列贬谪,于崇宁中蔡京当国时期致仕,“筑室于许,号颖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①。他在晚年所写的《诗病五事》中对王安石大肆攻击:“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略)’,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②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新法对于裁抑豪强颇有成效。

苏轼因不满新法,本着“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③的态度,于熙宁五年(1072)冬在湖州创作了《吴中田妇叹》。诗作借田妇之口,描述江浙一带农民遭受秋雨灾害的悲惨生活,进一步控诉了新法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的严酷现实。“汗流肩赭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受灾农民汗流浹背地担粮入市,期望卖得一点好价钱。可是官府故意压价,造成谷贱伤农的事实,米价低贱得如同糠和碎米一样。“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农民还得交纳繁重的赋税,他们只得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清人赵克宜所辑《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三评之曰:“透过一层,语极深至。”如此情状,恰如司马光在熙宁七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言:“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④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要米,即如黄庭坚《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诗所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都是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农民必须低价卖米,然后卖牛纳钱,这种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给农民造成了双重压榨,所以“官今要钱不要米”就涉及到新法弊政的本质。“西北万里招羌儿”,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了王韶的《平戎三策》,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此举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财;同时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令其在层层盘剥下走投无路、难以为生。诗歌最后化用典故,表达出格外沉痛之意:“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汉代龚遂和黄霸都是恤民宽政的官吏,这里是对当今廷臣的反讽。后一句化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意谓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在苏轼元祐元年(1086)所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更加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的《山村五绝》创作于熙宁五年(1072)杭州通判任内,集中而尖锐地反映了新法推行后对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其二云:“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此诗讥讽朝廷盐法过严,不利于民。当时武装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汉人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意即如果废止食盐专卖,让各地自由买卖,那么人民就能买到盐吃,武装走私者就无利可图,大家就会回到农业生产岗位上努力耕耘,连劝耕的布谷鸟也不用叫了。其三曰:“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此诗巧妙采用孔子闻

①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第8662页。

②苏辙:《栳城三集》卷八,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30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第8644页。

④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889页。

韶忘味来加以反比,同样讥讽盐法太急,致使百姓长期无盐可食。其四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此诗揭露朝廷推行青苗法、助役法致使农民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可是钱到手后随即就被胡乱花掉,剩下来的唯一收获就是农村孩子长期厮混在城市当中,学会了一些城里人的口音。此外,他的《和述古冬日牡丹》《寄刘孝权》等诗作也都对新法弊端加以批判,对广大农民寄寓了深切同情。正因为如此,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御史李定、舒亶弹劾,指其《山村五绝》等诗作“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①,故而遭受到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

但是,当时文人对于新法扰民的谴责并未因此消歇。郑侠曾多次得到王安石照拂,视其为知己,决心竭智尽忠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然而,在王安石推行新法后,郑侠目睹新法的弊端,多次向王安石直陈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在各州县施行过程中给人民造成的种种侵害,希望他改弦更张。政见的歧异使王安石疏远了郑侠。从熙宁六年(1073)至翌年三月持续旱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各地官吏仍然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致使饥民流离失所,不绝于道。郑侠将此惨状绘成《流民图》,并上奏《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次,夜不能寐。次日即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并罢除。民间欢呼相贺,神宗又下《责躬诏》,求直言。恰巧三日后天降甘霖,辅政大臣入内祝贺,神宗颁示郑侠所进《流民图》及奏疏,深责群臣的错误做法,他们都下拜两次以谢罪。尽管此后郑侠遭受到新党人士的打击报复,但是他矢志不移、为民请命的无畏气概却赢得了人们广为传颂,让苏轼“魂梦之间,未尝或忘”。李觏的长诗《哀老妇》同郑侠《流民图》一样,展示出北宋苛政背景下发生的一桩匪夷所思的人伦惨剧。诗歌描写一位守寡四十余年的六旬老妇,因为要逃避官府赋税的盘剥,不得不改嫁他人。“牵车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活画出一家老小生离死别的痛苦。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仰天长叹,对封建官府残害百姓的实质给予了无情的谴责。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下指出:“篇中所言,绝似元丰、熙宁间事,岂垂老见之,不禁哀悼耶!其伤心惨目不待言。‘吾君’一段,尤为婉挚。后来叙述吏弊,则郑侠《流民图》之所不及绘也。”此外,秦观《田居》组诗中的“得谷不敢储,催科吏旁午”、“倒筒备青钱,盐茗恐垂橐”,黄庭坚《上大蒙笼》中的“衣冠汉仪民父子,吏曹扰之至如此。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都通过对乡村凋敝的描写,揭露了新法的弊端、官吏赋敛的苛虐,寄寓着诗人对农民困苦的悲悯和同情。

(五) 流离失所

北宋时期繁重的苛捐杂税,富豪大量地兼并土地,导致许多农民陷入了无以为生的赤贫境地。梅尧臣的《岸贫》诗就形象地描绘出居住在河岸边上贫苦人家的生活状况:“无能事耕获,亦不有鸡豚。烧蚌晒槎沫,织蓑依树根。野芦编作室,青蔓与为门。稚子将荷叶,还充犊鼻褌。”诗作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户农民无地可耕、无食可吃、无房可住、无衣可穿的赤贫惨象。王禹偁的《感流亡》诗则真实记录了因陕西干旱而流亡河南的饥民惨状。诗歌采用白描、对话和戏剧性场景,描写了一个农夫搀扶着年迈双亲,提携三个幼儿,去外地逃荒讨饭,构成了一幅荒年流民图。诗人对他们“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恐大雨雪,僵死山谷间”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忧患和同情。

王令的《饿者行》同样对逃亡农民的饥寒交迫、乞食无门加以形象描绘。开头四句交代天寒雨雪、道路泥泞的恶劣环境。接着描写饿者缘门乞食的可怜形象:“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

^① 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857—1858页。

呼。高门食饮岂无弃,愿从犬马求其馀。”他只求高门赏一点残羹冷炙,把喂狗喂马剩下来的给点疗饥。可是他的卑微心愿却被冰冷的现实碾得粉碎:“耳闻门开身就拜,拜伏不起呵群奴。喉干无声哭无泪,引杖去此他何如?”流民躬身下拜、伏地不起,却被恶狠狠的群奴硬生生赶走。他乞食的指望无情地破灭,喉干无声,欲哭无泪,只得拄着拐杖,另寻别处。然而其他地方又将如何呢?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中所写“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逼真地刻画了饿殍遍野的现实惨象,也预示着这位饿者更为悲惨的结局。

王安石的《河北民》开头两句点明了题意:“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二边”指邻近辽国和西夏的宋朝边界地区。接下来分三个层次来介绍河北民的“长苦辛”。首先,“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农民辛勤劳作的果实却被官府转送给敌人辽和西夏,换取短暂的和平,人民也只得忍饥挨饿。“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人民遭遇天灾,而官吏却又强征百姓前去服役,这又是一层雪上加霜的人祸。“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南方农业丰收,而南方人竟然也被层层盘剥得无衣无食,逃难前来的河北民自然更是无法生存了。这样,北也苦,南也苦,就把社会的矛盾加以扩大,批判的深度也随之加强。“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天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天地因之昏黑,他们的惨状令道旁的行人无不黯然神伤。诗歌的最后两句采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悲愤:“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①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妥协退让的情形,正好跟唐太宗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言外之意就是对于当今朝廷盘剥百姓、重币贿敌政策的抨击。

周紫芝《竹坡诗话》云:“本朝乐府,当以张文潜(张耒)为第一。文潜乐府刻意文昌(张籍字),往往过之。”^②中唐诗人张籍与王建均继承《诗经》、汉乐府传统,擅以乐府形式反映民生疾苦,并称为“张王乐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张耒的诗歌效法张籍和白居易,关心民瘼,多悯农之作。他的《海州道中二首》以眼前看似富有诗意的乡村自然景象,反衬出田地荒芜和农户逃亡的现实:“荒田寂寂无人声”、“逃屋无人草满家”,给人以萧条荒废的感受。五言古诗《巢官粟有感》发出“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的叹息,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一亩》描写菜农饿死车下、妻子抱子悲啼的人间惨剧:“良人佣车毙车下,老妇抱子啼空室。”而其《和晁应之悯农》揭示“力田竟岁犹无获”的农民“为盗操戈足衣食”、“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预示着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最终会走上暴力反抗、拼死一搏的道路。

三、创作特质

北宋悯农诗歌继承《诗经》、汉乐府民歌、杜甫、白居易新乐府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采取多重对比手法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又体现出宋代诗歌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趋向。

(一) 多重对比

首先,表现贫富悬殊。范仲淹《赠钓者》所咏“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通过江上与舟中的两种环境、“往来”与“出没”两种动态、吃鱼人与捕鱼人两种身份的强烈对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283页。

^②周紫芝:《竹坡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4页。

比,显示出世道的不公。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〇引《翰府名谈》称此诗“实寓深意,不徒作也”^①。梅尧臣的《陶者》同样以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与富家贵族“寸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生活加以对照,与张俞《蚕妇诗》所写“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均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揭示出深刻的阶级矛盾。这似乎是此类诗歌惯用的表现手法,因此钱锺书《宋诗选注》对此诗的注语有云:“唐诗里像孟郊《织妇词》的‘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郑谷《偶书》的‘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于濬《辛苦行》的‘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掷梭女,手织身无衣。’和杜荀鹤《蚕妇》的‘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著苧麻?’也都表示对这种现象的愤慨。”^②吕南公的《勿愿寿》则出乎常理地直言“勿愿寿”,究其原因,在于“寿不利贫只利富”。接着交代“生平龌龊南邻翁”为富不仁,却锦衣玉食、气焰熏天;而“西家老人晓稼穡”,却缺衣少食、贫困不堪。故此老人了无生趣,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满怀绝望和怨怼。

其次,揭示官民矛盾。欧阳修的《食糟民》描写农民辛苦种稻,荒年无粮,官吏竟把霉烂的酒糟售配给农民充饥。诗作一方面是“田家种糯”,“还来就官买糟食”;另一方面是“官酿酒”,“酒沽得钱糟弃物”。种糯的农民“釜无糜粥度冬春”,官吏们却“日饮官酒诚可乐”。通过如此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封建官吏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以及官府与百姓的深刻矛盾。范大士《历代诗发》卷二三评曰:“贵贱之别,甘苦之殊,但以固然视之矣,作此触目惊心语,洵是圣贤分上人也。莫徒作好诗读过。”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在描写了严重灾荒下饿殍遍野的惨状后,紧接着却是“高位厌粱肉,坐论煖云霓”,尽显达官贵人空谈误国的可耻嘴脸。郑獬的《采皂莢》前半部分刻画采荸荠的农民艰辛劳作的场景:“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归。十指欲流血,且急眼前饥。”农民无以为食,只得在池沼里挖找荸荠聊以充饥。后半部分则写官府囤满民粟、硕鼠滋生:“官仓岂无粟?粒粒藏珠玑。一粒不出仓,仓中群鼠肥。”由此揭示出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饱含着对尸位素餐的封建官吏的切齿痛恨。唐人曹邺《官仓鼠》写道:“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官仓内的硕鼠正是吮吸民脂民膏的统治者的形象写照。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下评析郑诗云:“妙得风谣之遗,当与刘贡父《漕舟》诗同备采风。黄白山评:‘此诗赅《三百》之遗,使宋人所作皆如此,何遽让美于唐贤耶?’”文同的《织妇怨》则通过织妇哀怨的自诉,描述辛苦织就的绢匹横遭监官无理挑剔、刁难和退回重织,受尽了种种磨难,内心充满了悲愤,最后两句写道:“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正是通过监官的无情和贪婪,反衬出织妇无尽的痛苦,语语血泪,字字酸辛。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下评曰:“叙得絮絮缕缕,较长吉‘合浦无明珠’,劲浑不如,凄惋殆不能让。”钱锺书也指出:“比了唐人聂夷中《伤田家》里的名句:‘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这两句似乎更为简洁沉痛。白居易在《新乐府》的《缭绫》一首里,只慨叹人民‘手疼’织成的绫罗给奢侈的皇帝拿去糟蹋浪费,他不知道绫罗在入宫进贡以前,已经替劳动者带来了文同这首诗所写的痛苦。”^③

第三,彰显农民与土豪奸商的对立。封建时代名义上重农抑商,然而商人生活自由,更容易获得实利;老实巴交的农民则难有出头之日。早在西汉时期,晁错即已指出:“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④唐代元稹、刘禹锡、白居易、张籍等人都不乏歌咏商人富贵的诗作,宋人刘攽的《江南田家》则更进一步。诗作首先描写广大农夫劳作的艰辛:“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

^①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9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③钱锺书:《宋诗选注》,第37页。

^④班固:《汉书》卷二四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54页。

皆瘡痍。”他们拼死拼活地干活,真不如商贾清闲快活、名利双收:“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贵为郎。”宋朝商人不但结交官僚,而且通过捐纳资财摇身一变成为官僚。梅尧臣的《村豪》则描写依靠土地兼并而暴富的村豪恶霸奢靡阔气的生活,与他们形成对照的,则是农民无衣无食的饥寒。结尾两句“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揭露村豪已经形成了一股顽固的黑恶势力。他们权势熏天,鱼肉百姓,即便官府也奈何不得。在众多势力的盘剥压榨下,底层农民永无翻身之日。

(二) 议论化

北宋悯农诗往往采取叙事与议论紧密结合的方式,通过农民悲惨命运的描述,引发出诗人的感喟和议论。王禹偁自称“本以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继承了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的《感流亡》《对雪》等诗歌都展示出广大人民的痛苦,自己身为封建官吏却无力拯救,他骂自己是人民的蛀虫,流露出一士大夫道德良知的内疚和自责。《感流亡》描写农民荒年流亡的惨状,诗歌结尾写道:“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对他人的深切同情与个人的身世之感两相映照,引起他心中的强烈共鸣。五言长诗《对雪》先叙述自己与家人在京都团聚赏雪、安闲自得的情景,继而联想到河朔民夫和守边兵卒辗转穷沙冰雪、艰难困苦的生活,两相对照,触发了他深深的内疚之情:“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徐规评之曰:“是诗乃‘歌诗合为事而作’之典范,实开宋诗革新之先声。”^①王禹偁在《扬州池亭即事》中也自剖心迹:“民瘼不能治,惻隐情悲酸。况复多病身,名宦心已闲。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与杜甫“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褐裘覆絁被,卧卧有馀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村居苦寒》)之类诗作的思想感情一脉相承。

梅尧臣《田家语》诗全面记述田家遭受天灾、租税、兵役等多种打击后,发出了诗人的感慨:“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与中唐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意蕴相同。此外,欧阳修《食糟民》“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责我,我责何由逃”、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唐庚《讯囚》“参军噤无语,反顾吏卒羞。包裹琴与书,明日吾归休”等等诗句,都将诗人代入,推己及人,反躬自责,体现出道德内省的深度。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广大文人面对积贫积弱的时世,用诗文的形式表达出政治的忧患意识。他们不注重情韵的抒写,而是直接用诗歌的形式发表议论、干预时政,道出责无旁贷的诚挚忠愤之意。宋代士大夫文人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与底层百姓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对民生疾苦也有更多切身的体会和同情。当他们眼见农民生活的苦痛,自然会思考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同时也对自己享受朝廷优渥待遇却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而深深自责,于是在诗歌中出现了诸多关心民瘼、针砭时弊的作品。这些诗歌思想意义的揭示,已经超出了白居易《新乐府序》所说“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份量,而是带有更为浓厚的议论化色彩,体现出宋朝悯农诗创作的风貌特征。

(三) 散文化

受到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宋朝诗人更加普遍地将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融入到诗歌创作当中,梅尧臣、苏舜钦的悯农诗作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体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梅尧臣“去浮靡之

^①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页。

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①。他的《田家语》从催税、水灾、兵役,到民不聊生、诗人慨叹,写得像一篇叙事散文。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富有条理性,没有因为感情激愤而造成的跳跃感,这就反映了梅诗重视理智、淡化感情,从而追求古硬、平淡的艺术效果。此外,他的《田家四时》其四所云:“今朝田事毕,野老立门前。拊颈望飞鸟,负暄话余年。自从备丁壮,及此常苦煎。卒岁岂堪念,鹑衣著更穿。”《观理稼》所写:“稂莠日已长,匆匆芟薙初。来时露沾屦,归去月侵锄。一腹馁犹甚,百骸勤有余。吾无力耕苦,谬读古人书。”这样的诗歌结构明晰,虽有一些陶渊明田园诗的味道,但是更多带有宋朝理性诗人“以文为诗”的风格。

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从写景落笔,转入对饿殍遍野的描述,再到贫富两类人的不同境遇,最终归结为诗人的无奈慨叹。全诗完全采用散文化的叙述方式,笔法的转换逻辑分明,本应产生的愤懑之情被淹没在整体舒缓的节奏当中,起首美丽春景的描摹以及结尾化用杜甫诗句的议论,也都消解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批判力度,从而失去了诗歌感人至深的魅力。这就是诗歌散文化所付出的代价。

(责任编辑:蒋永华)

On the Poems Pitying Peasant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AO Feng

Abstract: The poems pitying peasant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of poetic creation originating in *Shijing* 诗经 (aka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folk songs of *yuefu* 乐府 (literally music bureau) in the Han Dynasty, whose theme is captured by the saying “The hungry sing for food; the laborers sing for work.” The later examples they followed are the realistic spirit embodied by Du Fu’s “*sanli*” 三吏 (literally three officials) and “*sanbie*” 三别 (literally three farewells) and Bai Juyi’s new *yuefu* movement advocating “Singing to make known people’s sufferings.” By means of multiple comparative techniques, the poems of this type fully display the miserable fate of the peasants under the heavy pressure of the land, tax and labor syste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pose the social re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reme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the sharp class conflicts, and express such complex feelings as compassion, hatred, and guilt held by th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Especially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poems embody the wise intellectuals’ courage to care about people’s misfortune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reform the bad governance system.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poems pitying peasants also show some stylistic features of argumentative prose, and are thus different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This constitutes the unique artistic style of the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ems of compassion for peasants; disput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parties; argumentative feature; prose feature

About the author: GAO Fe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①吴之振:《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页。